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        |              |         |
|--------|--------------|---------|
| 【广阔天地】 | “两个世界”的交叉（上） | 叶维丽·马笑冬 |
| 【书刊评论】 | 我触摸到属于他人的伤痕  | 王小鲁     |
| 【不堪回首】 | 他们为什么要整学生    | 张 从     |
| 【难忘岁月】 | 复旦往事（选载之八）   | 吴中杰     |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广阔天地】

“两个世界”的交叉（上）

• 叶维丽·马笑冬 •

◇ 当农民不用政审

叶：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妈妈都没去送。那天火车站的气氛有点儿凄凄惨惨戚戚。1968年夏天刚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班大队人马去北大荒，她们走时还有一股奔赴革命的味道。后来我再去火车站送人，就感到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我们走的时候，“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刚刚发表，车站上敲锣打鼓很红火，实际上很多人内心是无奈的，大势所趋，去不去农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不像你走时还有很多人是自愿报名的。

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经想走了。因为没学可上，在北京待得无聊，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团，宁可插队。

马：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兵团？

叶：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1968年11月我因为失眠睡不好觉，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散心。我表姐是1950年代的支边青年，她们一家人都在那儿。我看到刚刚从天津来的知青，穿着黄不黄、绿不绿的假军装，俗称“狗屎黄”，干什么事都得排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离开兴凯湖我去看望在黑龙江宁安县插队的两个中学同学，那几天我每天跟着她们去山里扛木头，累是累，但认识了不少老乡。干活休息的时候跟老乡们聊天，一个中年男人问人是从哪儿来的，又自问自答说是用泥土做的，要不为什么出汗时带出那么多的泥？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虽说他的答案不“科学”，但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

这让我意识到，对“形而上”问题的关心，不是书斋里知识分子的专利。我的同学去的时间不长，却已经和屯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参与一些当地的事务，我很羡慕她们这

种脚踏实地的生活。回到北京正好山西来招人去插队。我知道去兵团挣工资经济上有保障，但当时这些考虑对我不那么重要，我立刻就报了名。当农民不用政审，报了名就走人。

我们学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在雁北地区，离内蒙不远，是个穷地方。火车开到张家口，风一下子就变硬了。从大同到山阴改乘北同蒲线，向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后来知道是盐碱滩。视野里几乎看不见一棵树，给人荒凉贫瘠的感觉。房屋是用土坯盖的，老乡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历史上就穷，“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儿的人去内蒙古谋生。你说到云南的青山绿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有300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的冰。我们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颇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多块钱安家费，安家落户盖房子，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10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当年的床板，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馆，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乡争有限的资源，不受欢迎。我们那儿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我没感觉老乡不欢迎我们，当然也说不上多欢迎。我想他们是有点儿新鲜，也感到奇怪：这些城里娃干嘛来了？没有什么人把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当真，说老实话，没有几个老乡听说过什么“再教育”。

我们村子算一个大队，下面有9个生产队，知青分散到9个队里，每队三四个人，我在7队。虽然是大队编制，可是小队核算，7队算中等收入的队，我是队里唯一的女知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女劳力。我们那儿已婚妇女不下地劳动，偶尔有几个小姑娘去地里也是连干活带耍。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他们锄多少地我也锄多少地，我挣7分半工分，一个整男劳力挣10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挣这么多，不管你干得有多好。我们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因为差不多人人都有家里的“后援”，不指望这点儿工分活。我一年干下来，年底分红的时候，除去粮食钱、菜钱，也就能分到30来块钱现金。在经济上我们不能算真正独立，这点比不上你们。

但是我们比你们自由。到村里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在北京宽松多了。后来我不断在心里想，选择插队是做对了。村里前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运动的气氛了。当时的报纸上老说农村要“抓生产促革命”，怕革命冲击了农业生产。农民不干活和工人停产不一样，农民要是不种地，大家都别吃饭了。

我们村“吕”是大姓，老乡们说他们的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集合来的山阴，还说他们的祖先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村里曾经有个“吕祖庙”，我们去的时候这座小庙只剩下个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一些老习俗仍然很有势力，比如说辈分，辈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相同，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哪一辈的，在称呼上严格遵照辈分来，年龄倒在其次。村长是个辈分很高的人，没多少文化，开大会的时候打着官腔，连口音都变成他自认为的普通话，还爱搬弄报纸上的名词，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们听着暗暗发笑。开会常在晚上下班后，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个临时讲台，挂盏汽灯，村长一个人在上面讲，底下没几个人听，男人打瞌睡，女人说闲话，孩子们到处窜。城里的政治到了农村，就变了味儿。

村子里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老乡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林彪和叶群两个人都是双职工，他们怎么还反毛主席？

马：他们是什么意思？

叶：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个人上班挣工资，吃皇粮，别人家就羡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两个“双职工”，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还闹什么事？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那时候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们的说法愚昧无知、荒唐可笑。可几年下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如果一家有两个双职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城乡生活的距离之大，使一些农民完全没法想象“双职工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呢？

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不满，说起来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一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在社会底层），把我送进监狱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作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大后生——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男青年叫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显然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在城里要宽松许多。

作为城里人，咱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而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不动。一个后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上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况，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发现，我们的黄米还没怎么吃，米口袋已经下去了一大截。黄米是细粮，很金贵。再一“侦察”，知道都是老汉一次拿一点，慢慢偷走的。这下知青们炸了窝，对老汉不依不饶，数那个说“一看就是贫下中农”的女生反应最强烈，最后老汉只好走人了事。其实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饭。粮食下来后堆在场上，不时听说少了。每个队都有专门“看青”的人，他们不下地干活，到各处地里转来转去防止人偷庄稼。其实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块地的玉米快熟了，掰下来烧把火烤了吃。刚去村里时，老乡们对待“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爱集体”。

我们那儿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管好劳力叫“好受苦人”，我们知青干起活来都还比较实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学会了用扁担担水。有一次担水浇队里在远处的一块地，我一口气担了15趟，真把我累坏了。还有一次我们7队和6队在一起干活。6队有个老汉是个大能人，不但干活是把好手，逢年过节还会耍狮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干活时他暗中在看。收工时他说了一句，“你会受苦了”，意思是我会干地里的活了。为他这个话，我心里得意了好多天，到现在仍然觉得它是对我5年插队生活的最高肯定。

◇ “吃了没？”

叶：在队里，我交了几个老乡朋友，都是老实巴交的“老汉”。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汉特别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里的一个家。老汉有胃病，脸色发乌，他有一家子人要养活，最小的孩子还在炕上爬。老汉的妻子——当地的称呼是“高典老人”——老家在晋南，虽然嫁到上河西20来年了，可是仍然被村里人看做是“侂子”，笑话她说话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汉家在村里又穷又没地位。遇上节日我到他们家去“吃请”，比如中秋节，别人家还能吃顿羊肉萝卜馅饺子，他们家顶多就是素馅饺子，但因为是白面的，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了。

马：你在村里几年，农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行？

叶：从收入来讲，绝对没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当做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们刚去的那年，我们7队每人分20斤麦子；5年后我走的时候（1973年），每人才分7斤麦子，磨成面就更少了，所以一年吃不上几顿白面。别的队也大同小异。吃顿白面是件大事，能乐上好些天。老乡在地里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吃。离中秋节还有好几个月，老乡就开始聊过节那天吃什么了，几乎天天说，一直说到过节那天吃上一顿。老乡见面打招呼说“吃了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了。我们队有个妇女去过北京。当时她儿子在北京当兵，她去探亲。她最爱跟人讲的北京见闻是去颐和园和吃油条，油条比颐和园还让她津津乐道，我就不止听她讲过10次8次。

你讲到在云南看到的贫穷对你的震撼，我对贫穷也有几个永远忘不了的镜头。有一年秋天我们队分山药（土豆），我们先把山药从地里收回来，堆放在村里当街一棵大树下，留一个人守着，别人先回家吃晚饭，饭后各人拿着麻袋箩筐什么的去领自家那份儿。除了粮食，我们从地里收下的东西都这么分。那天晚饭后我拿个箩筐去领我那份儿，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秋风萧瑟。走出巷子，我看到在大树底下站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人，有的披着麻袋片，在冷风中哆嗦着等着分山药。我突然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不是一群乞丐吗！天天在一起干活，我视而不见，没有特别留意，但那一刻站在远处，我一下子“看见”了。我觉得心里作痛，这都是我朝夕相处的乡亲。在他们中间仿佛也有我，我自己的衣服也很陈旧，一件外衣穿了七八年，头上裹着老太太戴的？头巾。但我又清楚其实我并不在里面。

还有一次，我出工晚了，赶到地头，已经看不见人了。玉茭子长得又高又密，人们在里面锄田，地头散落着鞋。老乡们为了省鞋，夏天常常光脚锄田。我头一次好好地看了一眼那些鞋，都是一针一线做的“老农民鞋”，一双双不是前头开了口，就是后面穿了帮，要是在城里，早都该扔了。后来我看到凡高的一幅画，画的是一只破旧不堪的皮靴，让我想起我们地头的那些破布鞋。在村里几年，我学会了从一个人穿的鞋来判断他（她）的家境。

还有一个镜头发生在另外一个村子里。1971年的冬天，我到临近朔县的一个公社参加了几个月的“一打三反”，主要是清理经济账目，整顿村里领导班子。那时候知青们已经不爱干这种事了。我呢，别人爱干的时候我不干，到人们都不干的时候，我倒想干了。我觉得在上河西生活了几年却并不了解农村，这次是个机会。我去的村子不大，我们每家吃派饭，没过多久，村里人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记住了，交了不少朋友，知道了很多事。我们的工作最后不了了之，“运动”式的做法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结局。

有一次我在一个老乡家炕头坐着和女主人聊天，她有个3岁左右的小姑娘。那孩子隔一会儿就到窗边去一下，我们说话的工夫，她去了几次。我纳闷她在做什么，就扭头去看。原来窗台上放着一块水果糖，最廉价的那种，连糖纸都没有，大概是从村里代销点买的。她走过去，舔一舔那块糖，放回窗台，过一会儿再去舔一下。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自制力，知道这糖宝贵，不能一下子吃了，只能每次舔一舔。这个女孩轻轻舔糖的动作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这些贫穷的细节不断加深我负疚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老乡，可是我什么都没做。离开村子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歉疚。

◇ “女儿，女人，老人”

叶：刚去村里的时候，我常在脑子里跟自己讨论是不是要一辈子当农民，一天到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旦上山下乡，我们的城市户口就被注销了，大家都明白再回北京很难了，前途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当时官方的号召是要知青扎根落户，中国的政治情况也让人看不到有别的前景，一辈子当农民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像你一样，我也留心农村妇女的生活，在心里问自己能不能也那么活。

马：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婚姻。我们那儿管嫁姑娘叫“聘女儿”，男方要给女方家彩礼钱和衣物。我们刚去的时候彩礼钱是600块钱左右，5年以后，涨到1000到1200块钱左右，几乎增加了一倍。知青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显把人当商品卖吗？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还存在买卖婚姻？让我们奇怪的是，女孩子们一点儿也不认为她们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们说父母养她们这么大，要彩礼是应该的。平常她们没有像样的衣服，借着出嫁可以要上几身新衣服和一块手表，穿戴上在村里街上走一走。每逢我看到一个聘出去的“女儿”，身穿婆家送的新“条绒”（灯芯绒）上衣和“华达尼”裤子，有些不好意思又有点儿得意地在人前走来回地走，心里总忍不住有些怜悯。

有的女孩在村里有“相好”，但也不得不远嫁他村。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女心里绝不会真正欢喜，但也认命了。我在村里5年没听说过有抗婚的。我们女知青的年龄在18、19到20出头之间，村里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出嫁了。我们队有一个跟我不错的一个女孩儿，我去的那年她结的婚，两三年后，她两三个孩子都有了，拉一个抱一个，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原来挺秀气的女儿，现在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就跟你所说的那个傣族女子一样。

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姑娘叫“女儿”，结了婚的叫“女人”，上了年纪的叫“老人”，女人一老就没有性别了。“女人”这个词和生育密切相关。

我们在村里那几年，生产没有上去，收入没有增加，但“聘女儿”要价却越来越高。我们知青在一起老纳闷老乡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娶媳妇除了聘金，一般来讲还得盖新房子，那开销就更大了，很多人家就得拉债。我在村子的后几年，“换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马：什么叫“换亲”？

叶：“换亲”就是如果一家有兄妹两个，就找别的村另外一家也是兄妹俩的，把妹妹嫁过去给那家儿子当媳妇，哥哥娶那家的姑娘。这样双方都不用出聘金，没有“资金的流动”，婚嫁的大宗开销就省了，这是穷人的办法。我们知青院子有一个常来串门的小伙子，我们叫他“老懂”。老懂对外面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老到我们那儿去看报纸，听半导体，和男生聊天。他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男生给了他个外号叫“老懂”。老懂非常聪明，人也长得端正。他家没钱，只有换亲，先把他妹妹嫁给外村一家人的儿子，他再娶那家的姑娘。他娶的媳妇从各方面看都和他不般配，老懂一天到晚不在家待着，娶了媳妇也不着家，老泡在我们那儿。他在村里有个相好，是个“好人材”——我们那里管长得漂亮的女子叫好人材。漂亮的女儿要价就高，老懂没钱娶她，她嫁给别人了，我们都知道老懂心里不痛快。

换亲容易出现悲剧，男女双方都没有幸福，但往往女性受害更深。如果妹妹跟哥哥的年龄差不多、对方家庭各方面情况都般配还好，这样18岁的妹妹先嫁给年龄相当的男人，再给20岁的哥哥娶嫂子。可是常有的情况是哥哥都二十四五岁了还没结婚，所以妹妹一到十五六岁就给嫁出去了，老懂家就是这种情况。老懂的妹妹小小年纪，一个人嫁到个陌生的地方，她的婚姻是为她哥哥服务的，比起老懂，她更惨。

这些都是现在的想法，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用城里人的眼光看，觉得当地的风俗就是这样，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结婚要聘金是因为贫困，没想到这样做还反映了妇女从属的地位，看待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一个女性的视角。你看到那个云南姑娘的变化那么震动，你是把自己当做和她一样的女人了，我缺乏你那样深的同为女性的认同。像你一样，我的结论也是不能像村里的女人那样生活，连想象一下过那样的生活都能让我浑身发冷。其实除了贫穷，女人从属于男人的低下地位也是我不能认同村里女人生活的重要原因。毕竟我们受过“男女平等”思想的教育，再回到男权社会是不可能了。

（未完待续）

□ 节选自叶维丽、马笑冬：《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2008年。

~~~~~

### 【书刊评论】

我触摸到属于他人的伤痕

· 王小鲁 ·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由林贤治主编，本书的定稿其实2004年就完成了，但一直没能出版。直到今年5月上旬，忽然接到林先生电话，他高兴地说这书出来了。我却恍惚得很，因为我把这事给忘了。当初我为这本书整理了一部分内容，在济南和北京共采访了四个“黑五类”子女，如今那些受访者除了路大荒的孙女外，其他的我连名字都不记得了！直到后来接到新书，才又回忆起自己帮助整理书稿的过程。

2003年的冬天，林先生给我电话，希望我帮助找一些黑五类子女进行采访，因为到现在为止，“黑五类”在国内还没出版过专书。他特别嘱咐我：就去基层找。我现在看到此书的结构，才了解他的意图，大概是要展示尽可能多的社会层次。本书中已收录了高层知识分子家属的文章，比如胡风、路翎、章乃器、陈企霞等人的子女皆有文字，还有彭小莲导演有专文记叙乃父彭柏山事件对她的影响……我就在春节期间带着采访机回老家，请父亲代为寻找合适的对象。父亲找了一圈回来，却没有收获。他说大家都不愿意讲，觉得过去那段经历乃一生的耻辱，讲出来很丢人，没人再去揭开那层伤疤。

这真让我唏嘘不已，我记得当时还跟父亲分析社会环境的问题，当一个人被打倒在地，哪怕后来证明被打错了，但是你已经失败者了，你的身上已经带有了让人耻笑的烙印。他们不愿意讲述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提供让他们讲述的文化环境。若过去不被讲述，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某些东西已经成为一种内化于深处的恶，成为一种自戕和戕害他人的力量。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我后来的采访对象梁志强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下岗工人，他说他的精神一直受那段历史影响，现在的他为了寻求清静，开始学佛。他说：“其实很多黑五类子女想不开，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好多人都有仇恨的心理，现在精神病为什么增多，与这个有关！”

对于作家、学者来说，可以从那段往事中发现文化的价值和历史的深邃，历史可以转化为有益的资源。但普通人很难完成这个转化，它只会变成一个潜在的破坏性力量，它总会在某处爆发，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状况，一定与几十年前的斗争史有关。历史上的历次政治运动在今天的回响，对今天正在发生的琐碎事件所发生的作用和力量，是非常隐蔽却又非常实在的。你仔细搜寻会发现，每个家庭几乎都曾参与这样的斗争史，而这种邪恶斗争形成的心

理扭曲会通过家庭成员向下传递，而我们的社会对于这层发生于精神深处的灾难，采取回避的态度。在本书序言里，我看到林贤治在他的家乡广东阳江，采访也不顺利。后来，我依靠一些曲折的关系以及我自己的交往，在北京和山东各采访到两位黑五类子女。其中一个受访者路方红，她是济南人，我与她的父亲的交往，是一段让我难忘的经历。

她的父亲路士汉是我在济南做记者时就认识的。他是蒲松龄专家路大荒的儿子，是山东淄川人。蒲松龄的大部分手稿是路大荒搜集、购买并保护起来的，日本人当年侵略淄川，对于蒲松龄文物觊觎已久，路大荒背着这些手稿四处躲避，还有亲戚为此惨遭日本人杀戮。这些手稿最后大都无偿捐献给了山东博物馆，但是“文革”后他仍难以幸免，最终遭受残酷的迫害。这个迫害延伸到了他的儿子，一直到他的孙子孙女。路士汉是济南一所著名医院的最早筹办者，一个鞠躬尽瘁的大夫，但是在我2000年采访他的时候，他仍然住在一个只有2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没有厨房，只有一间很小的卧室和客厅。这让我大为惊讶。“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夫妻俩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儿女也小有成就，哪至于如此清苦？记得采访完了路士汉后，我还跟他一起去淄川的蒲松龄故居寻访旧迹。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济南大明湖畔探望他父亲当年的故居。但是此后我离开济南，多年失去了联系。

为了做《烙印》的采访，我从前同事那里打听到路士汉，得知路老已经去世了。于是我给他的家人打电话，那是清早在宾馆打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儿子。我报上姓名，然后说明来意，还未等细说，对方声音低沉，直接地说了几个字：“你来吧，我们在家等你。”这样的回答让我觉得惊奇，我并不认识路的儿女，可是他的回答就像我们每天都在联系一样。等我在上午10点左右到达他们现在住的新楼房，路老的家人在屋里等我。他们说，你知道，今天是路老的忌辰，他去世恰好一年了，而且你刚才进门的时候，也正是他咽气的那个点。

这是巧合，或者其中有某种心灵的感应？我多年未到此城，没想到一来就有此巧遇。我发现我当初发在《齐鲁周刊》的整版报道——连载了两期，整齐的摆在一个桌子上，好像还是新报纸一样。路的儿子说，我父亲活着的那几年经常提到你，这个报纸他经常拿出来看，说你写得好，去世前那几天他还念叨，说不知道你现在到哪里去了。

我知道当初我的文章对他也许很重要，但真没有想到有这么重要。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路家采访的时候，路老的妻子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在一边静默地坐着、听着，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内心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很久后，我才了解这种喜悦的深沉的含义。

“文革”后，路老单位的领导其实仍然是“文革”中掌权的，正是他们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路老14岁的儿子也被打成反革命，在礼堂接受专门的批斗，这个经历毁了儿子的性格，他本来是大院里的孩子王，但是此后一直唯唯诺诺，我见他的时候，也仍然表现出一种过分的谦卑。虽然路老的父亲和家人被平反，且有周扬和梁漱溟以及一些领导发来慰问电，按照世俗眼光，可谓哀荣备至，但是这些在现实中都不能改变什么。路老向来耿直认死理，分房的时候，绝对不愿意低三下四去求情，他从来没有服输过，因为他的行为一直是正大光明的，现在他若稍显服输，自然什么都有了。领导毕竟是领导，不愿意在精气神上甘拜下风，于是路老去要房子的时候，不是电脑故障把人名删了，就是刚好分完了最后一户，你等下次吧。

其实路老家绝对不是穷人。我看到他的房间墙壁上，挂的是溥心畲（溥儒）和齐白石的绘画，他还曾拿来梅兰芳的画扇给我欣赏。当年路大荒是蒲学专家，也是文物学家，他与张大千等人皆有往来，屋中所悬皆是真迹。而且我在那间昏暗的斗室里看到过蒲松龄的亲笔手稿——《观象玩占》。这些文物随便一件都可以换一套新房，但是他们却在这20平方米里

苦熬！女儿曾要求二老和她一起住，他们拒绝了。这样的行为中，利益考量只是一个方面，这里有一种微妙的心理活动，他们住在这里，是一种惟一能实现的谴责方式，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个谴责方式。

迫害仍然在延续，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我们经常在书中看到政治运动谁谁被恢复名誉，平冤昭雪，于是觉得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实远非如此。在《烙印》这本书里，路方红讲述到后来他的父亲终于住进了新房，原因是医院换领导了。但住进去不足半年，路老就撒手归西。我认为临终前的路老并不像其子女表述的那样，是心下释然的。与他交往有限，但是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他的。屠格涅夫说，迟到的幸福让人恼火，因为它扼杀了我们继续抱怨生活的权利。那些补偿来得太迟了！路方红讲述父亲去世前的情形，证明着我的看法——

父亲临死前把我和哥哥叫到床前，让我们给他整理整理衣服，不准外人参加，直接把他抬到火葬厂，把骨灰埋到我爷爷坟前。不准我通知亲戚朋友，连他姐姐也不让告诉，更不让我们告诉单位。按照资格他可以进济南四里山革命公墓，但是他说，我不去，我一辈子没沾人家的光，死了也不沾光。我们按照他的遗嘱来办，没有人送花圈，没有人吊丧，没有遗体告别仪式。

这真是一幅悲凉的画面，其中有某种冷硬的东西，我发现在最后的岁月里，他的心还是没有被暖过来，他对于人性似乎有彻底的失望。

当时我采访后写成的文章，不仅发表在《齐鲁周刊》上，还被多家报纸转载，比如河南《大河报》、《中华读书报》。在《读书报》发表时他特别快乐，说那是《光明日报》办的。《光明日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特殊的位置，所以他非常看重这次发表。他对我说，你的文章是我父亲路大荒去世后第一次对他的事迹的发表（也许应该是惟一的一次），他为国家为民族做了这么多贡献，最后给你一张纸说平反了，然后就什么动静都没有了。

我去采访他，首先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后来几次交游却不再是工作，我们一起去寻访大明湖畔路大荒的旧居，那个狭窄的百年小楼临着历下亭，位于秋柳园的边上，是大荒先生当年躲避日本人隐姓埋名栖宿多年的所在，甚至在曲水亭附近，那个曾经名流雅集的老房子也在，如今墙壁已经开裂，但是仍然有人住着，门口的石榴树仍然是路大荒生前就栽植的。那时候的我感情丰富，处处用心动情，所谓“寻常青苔痕，步步生惻恻”，我对于路老的故事，是抱有深切的同情和愤怒的。那几次交游的经历，我记得还以诗歌做过记载，如今还记得几句：钟鸣泺湖堤草长，笔花依次归大荒，剩此燕雏已垂老，绕树重来访旧梁，曲水难留蒲留仙，秋柳不吊王渔洋……我的心情，我想他也一定是有所察觉的。

记得有一次与致力于口述史的学者邢小群女士同车，闲聊中谈及一些青年学者比如余杰的“文革”研究，她说，没有经历过的人在引用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觉得有点隔膜，味道也不对。我非常理解她的意思。那些运动历史里包含了人性黑暗的深度，这是人性的一种可能性，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让后来人知晓它的运行逻辑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的历史不仅仅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开始，而如何把我的肉身未曾亲历的历史经验进行嫁接和移植，有血有肉地接通到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我自忖与路士汉一家人的交往是一种有深度的交往，是一次对于历史的有效学习，路士汉老人的讲述让我如临其境，那伤痕和烙印长在他的身上，但是我在某一刻也真切地感觉到了疼痛，也真切地认识到这种让人疼痛的制度环境不该存在。学习历史不能仅靠一些数字和知识框架，要有人耐心地讲，有人细心地听，须有细节，见真情，因为历史展现在最细微的地方。像邢小群和林贤治做的口述史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传授策略和记忆策略。我曾跟林先生讲，其实做这样的历史工作，拍纪录片是最好的方



式，因为纪录片在纪录细节方面有文字难以达到的优越之处。我自己就有一些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拍摄项目，惜乎没有资金支援，仅靠一个人投入是支撑不了太久的。而国家的研究机构，更是很少对这种历史题材投入精力。数十年后，《烙印》的出版，竟然还是首开先河，看来这个黄金遍地的时代，人们无暇自哀。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还收集了作家刘烨园的长文《从灰类到黑类》，这是书中最长，也是写得最用心最壮烈的一篇。刘先生辍笔多年，这篇文章应该是2004年之前的旧文，读起来字字坚实铿锵，令我震动。其实刘烨园先生的悲惨家史我早就听他本人讲述过，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关注历史也受到他的很大影响。他一边讲事件一边陈述自己的艰深思考和精神成长历程，这给予我新的启发。另外，我在读《烙印》中的一些文章时，其实最为感动的，是几乎每个讲述者都在那个黑暗如墨的时代遇到过一两个良知未泯的恩人，他们在那个时代互相之间不敢深交，但是片刻的彼此注视，已经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力量，可惜比较那无边的残酷，这样的良知显现，比例仍然是太少太少了。

□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年6月5日

~~~~~

### 【不堪回首】

#### 他们为什么要整学生 ——从工作组、校文革到宣传队的一脉相承

· 张 从 ·

北京大学文革过程中，从1966年6月初～7月底的工作组时期，到1966年8月～1968年8月的校文革时期，再到1968年8月宣传队进驻，到1970年3月所有在校毕业生，北大的学生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在这三个不同时期内，虽然情况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这三个时期都在不停地整学生。

#### 一、工作组时期

1966年6月2日零点30分，华北局工作组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宣布华北局决定：派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4日，陈伯达来校看大字报，向学生讲话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当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向工作组指示：“要依靠群众，组织坚定的左派队伍，要争取中间多数，分化那些少数坏的，孤立打击最坏的。”（见《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第756～757页。）

工作组进校后，各系的工作组深入年级、班级，在“阶级分析”基础上，按照“亲不亲、阶级分”的路线和“扎根串连”的办法，依靠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学生各班级建立学生“文革小组”。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学生“文革小组”与工作组相结合，对同学进行“左、中、右”排队。

据化学系1963级学生华国藩回忆：“03633班当时共有32名同学，经过张承先工作组和班级“文革小组”的“排队”，在学生中列出7名“右派”。这7名“右派”

中，6名“家庭出身”为“黑五类”、“剥削阶级”，另有一名出身为“中农”的雷同学。雷同学“家庭出身尚可”，还曾任化学系团总支委员，做过“学毛选”的“讲用发言”，不知缘何被“文革小组”黑箱操作，搞成“右派”。而另外6位同学（其中一位女同学是归侨），没有任何言论或者行为，完全无辜地被加罪，搞成“右派”。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03633班学生“排队”结果不胫而走。“右派”是什么意思啊？

1957年“反右斗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阶级敌人”，沦为异类，被开除、被下放、被劳改、被判刑乃至被残杀，受尽人间极致的残害，牵累全家，甚至波及九族。03633班在校内文革“风乍起”阶段，就已经被“文革小组”黑箱操作莫名其妙地“排队”为“右派”的七名同学，生死悬于一线，岌岌乎殆哉！”

类似化学系的情况在其他系也都存在，笔者所在的技术物理系也存在同样情况，由革命干部出身和工人出身的班干部组成的班文革小组也给全班同学划分了“左、中、右”，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主张对“落后同学”多做政治思想工作。

好在工作组当权时间不长，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狠整“右派学生”，自己就灰溜溜地被赶出学校了。那些排队的“黑材料”很多也被学生抄出来烧掉了。03633班的学生排队材料就是被工作组走后新当选的文革小组成员樊能廷亲手烧掉的，全班同学在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18日一部分学生未经工作组同意，在38楼门前设立“斗鬼台”，揪斗了一批所谓“黑帮分子”，引起了工作组的恐慌，当成了“重大事件”。一面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一面进行调查，收集情况，要抓出事件台前幕后的黑手。当晚，张承先在广播讲话中说有四个人带头打人、耍流氓，其中点了东语系学生陈某某的名字。6月20日，中央将北大工作组关于618事件的《第9号简报》批转全国。工作组为什么能很快抓出618事件中打人的主要分子，是因为工作组有一个专门的保卫部门，其中有专业的保卫干部，如谢甲林，也有从法律系吸收的工作组认为“政治可靠”的学生。他们白天穿着便衣混在群众之中，盯着可疑的人，夜晚则拿着带闪光灯的相机拍摄大字报，把认为有问题的大字报洗出照片，辨认笔迹。这个保卫组继承了前苏联保卫部门的那套工作方法，很专业，效率很高，成为工作组的耳目和工具。

张承先工作组在50天内没有和学生发生公开的正面冲突，中央文革首先来到北大宣布工作组的“罪状”，所以北大没有出现像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西安交大李世英那样因反对工作组而挨整、成为造反派领袖那样的人物。但是工作组期间把学生分类排队的做法直接制造了学生的之间的矛盾，是后来导致学生分裂成两派的渊源。例如03633班的被工作组划为“右派”和同情他们的学生后来参加了“北京公社”和“井冈山兵团”，而参与划分“左中右”的班文革小组成员和支持他们的学生则参加了“新北大公社”。

## 二、校文革时期

1966年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接管了北大，掌握了北大的领导权。校文革成立后，接收了张承先工作组的保卫组班底，称为“二组”。

8月份到9月份，大部分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校内矛盾不突出。10月6日，物理系学生路远、周闯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10月份，围绕聂元梓组建北大“党组”等问题，原来和聂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逐步公开化，与此同时，北大各群众组织也发生了分化，逐步形成对立的两派组织，一派以“红旗兵团”为代表，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一派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聂元梓和校文革对反对他们的群众组织和学生给予坚决镇压，无情打击，把他们打成“反动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12月12日，红旗兵团召开大会，批斗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和在北大居住的外校退学学生杨炳章，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到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清、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1967年2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这些被点名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在系内、班内受到批斗，被整了“黑材料”，有些还被抓进监狱关押（如杨炳章、何维凌、胡定国、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等）。

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和示范下，各系文革和校文革支持的“新北大公社”（1967年2月15日正式成立）也陆续“揪出”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或散布过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不满思想的学生进行批斗。例如中文系“系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红七团”对陈一谔、沈达力（女）进行了残酷的批斗，沈达力不堪侮辱，被迫自杀。中文系1963级学生刘平（女），“文革”中因对江青、林彪有不满言论，1967年2月被中文系“系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进行揪斗迫害、“不予分配工作”。刘平被迫服毒身亡，时年23岁。

陈一谔是中文系61级学生，共产党员。在社教时期给党中央写信，表达对中央政策的不同看法，在文革中反对聂元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7年3月17日下午1点，我被8个人从32楼押到第二教学楼，脖子上挂了一个沉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谔”的牌子，两个彪形大汉反剪我的双臂，让我坐着飞机，连踢带打把我押入了102教室。500人的教室坐满了中文系师生，由任喜贵带领着高喊：“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谔！”“谁反对聂元梓就打倒谁！”、“陈一谔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各种打倒我的口号。

黄介山主持会议，恶狠狠地讲了几句话上纲上限的话，走过来揪住我的头发让我“认罪”，我刚说了一句“我没罪！”就遭到一阵毒打。接着，新北大公社的骨干轮番揭发我“恶毒攻击”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江青同志、活学活用、反右派、不民主、社会主义、聂元梓和新北大红色政权等罪行，说几句就打一顿，头发一缕一缕揪下来，汗水和血水浸湿了地面。

开始，我还能有些反抗，高喊着：“你们实行法西斯专政！”、“聂元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照亮新北大！”。但16个人分4个组不断轮换，将我倒架双臂、按上下身、揪住头发、仰头向上还不断殴打、脚踢，4个小时的酷刑折磨，使我渐渐失去了知觉，恍惚中，马西沙大喝一声，把我右臂给拧断了，任喜贵又用腿把我左肋踢断了。我瘫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昏迷中我被几条大汉架出会场，倒拖着拉到32楼，扔到了宿舍的床上。依稀中感觉自己还有一丝游息，只要停止呼吸就可以死去。活着是那么艰难，死却非常容易。人一死也就一了百了了，可是又怎么能就这么死去呢！

混沌中似乎听到楼下高喊着：“沈达力畏罪自杀罪该万死！”的口号，心中吃了一惊。再细听，果然是沈达力自杀了？！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动弹不得，泪水从眼角不知不觉流了出来，我又昏迷了过去。”

沈达力是中文系62级学生，因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组织红联军，而受到系文革和班文革的批判。

笔名为“多思堂主人”的北大校友回忆：

1967年3月12日，沈达力最后一次从上海的家中走出来，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因为批评了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她是被老佛爷的爪牙勒令回到学校“认罪”的。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但是她非常害怕，也许她已经预感到什么，她在家里做了准备。

她还不知道，“班文革”给她定下了“五大罪状”：

1. “反对中央文革”

听说中央文革已经对北大的问题表态，校文革确定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和“红联军”是“反动组织”。沈达力却说“中央可能不了解情况，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说明她对中央文革是不信任的，对中央文革是有不满情绪的。在全校的大会上，她代表“红联军”发言，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校文革就是校文革。”这是公开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挑拨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关系。

2. “和反革命的边缘人物有关系”

沈达力和“红联军”的头目、“反革命分子”俞启义、张志握、赵丰田（均是哲学系学生）密切往来。对于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的人，竟然说他们“也不一定是反革命。”

3. “顽固反聂”

沈达力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红联军”，属于中文系的“猛虎团”，知道中央文革支持聂元梓后，还有些想不通，不知悔改，是一个“女干将”。

4. “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沈达力的父亲曾在美国旧金山留学，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对父亲十分崇拜，关系十分密切，可见她“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5. “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沈达力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阶级烙印很深，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比较严重，经常爱出风头。

掌权的“班文革”早已得知她要回来了，3月11日就开始认真策划和准备对她的批判会。先是召开了全班的“揭发动员会”，接着布置其他各班配合行动的办法。几乎每个同学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了揭发批判的大字报。从11日晚上到12日白天，全楼道里无处不贴满了关于沈达力“罪行”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从一楼直贴上三楼的楼梯，从男生宿舍一直贴到女生宿舍，一直贴到她的门上。宿舍门的正面，是赫然醒目的《警告》，旁边是一些标语，包括：

“闻名全校的母老虎”、“母夜叉沈达力”、“沈达力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沈达力不投降是死路一条！”“沈达力必须低头认罪！”等等。几个女同学还在她的床头贴上一条毛主席语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

这是何等萧杀的气氛！

她浑身颤抖地看着这一切。她的精神防线已经崩溃了。

沈达力，不仅美丽，而且文雅。但她毕竟是一个天真善良，又有些懦弱的女孩，她是与所有女孩子一样很爱面子，也颇自尊的人。她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狂风恶浪！

3月13日清晨，她很早就起床了，这个爱干净的女孩没洗脸就开始抄写在上海家中起草的大字报《我的检查》，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外面。早饭后，她被叫到中文系男生居住的32楼看人们给她贴的各种大字报。与此同时，班里开始了“天天读”，“天天读”结束

时，大家齐唱了语录歌：“人民靠我们去组织…”和“凡是错误的思想…”。散会后，“班文革”的一位领导小组成员找沈达力谈话，对她进一步施加了压力。

当晚，沈达力在全班的会议上做了第一次检查。她眼含泪水念完了自己的《向毛主席请罪书》，同学们则进行准备好的批判。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是“避重就轻”、“投机成性”、“蒙混过关”。结论是：“请罪没有诚意，再往下滑是危险的！”

3月14日，全校同学都被组织去参加“打倒谭震林”的游行了。她在宿舍里，一边哭，一边给母亲写信。中午，一个外校的老同学来找她，她痛苦地对那个同学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3月15日，她上午在宿舍里继续检查自己在几个月来的表现，因为下午她要在班里的批判会上进一步检查“罪行”。下午班级在各处张贴了海报，召开“沈达力问题串联会”。来了一些其他年级和其他班级的同学。串联会集中讨论三个问题：

1.沈达力曾经公开表示同意“红联军”赵丰田的“北大左派先天不足论”；2.对中央文革认定“井冈山”和“红联军”是“反动组织”想不通；3.对于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的人，认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对于这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决定要求沈达力交出她的“黑材料”。

晚上，“班文革”在沈达力宿舍的门外又贴出了一张《通令》，说她“犯下了滔天罪行”，逼迫她“立即交出全部黑材料。”深夜，她一个人在未名湖边转来转去，痛苦万分。抬头仰望天上的北斗，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至半夜11点多钟才回到宿舍。

3月16日，上午全班同学都去听农业科学院一个人到北大做报告，暂时没有人理睬她。

下午，“班文革”带领一些同学聚集在她的宿舍，十分严肃地要她交出“黑材料”。这时，沈达力的神志已经不很清楚了，她茫然地把自己的衣箱书箱打开，把本本、信件之类全摊在地上。她蹲在地上，把东西一件件拿给她们看，边翻边问：“这个你们要吗？”“那个你们要吗？”她的双手哆嗦着，满脸通红，汗水直往下流。

班级里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的某同学感到沈达力仍然有“抵触情绪”，立刻跑到不在现场的“班文革”领导那里汇报，说“沈达力不老实，不愿意交材料！”

这个人马上气势汹汹地赶到宿舍，恶狠狠地训斥道：“你还有好多材料怎么不交？”并命令同学立刻“查抄”。所谓“查抄”，就是完全不顾她的人格尊严，把私人的一切抖搂在大家眼前。

实际上，沈达力已经把一切“材料”都交出来了，包括前天即14日写的日记。

晚上，“班文革”领导亲自出马与沈达力“谈话”，没有人知道她们谈了些什么。

但是，在14日的日记中，沈达力已经写出了不想活下去的意思。这个“班文革”领导到底与她说出了什么呢？

17日上午，全体学习《解放军报》社论和《文汇报》社论，沈达力也参加了学习，表面看是平静的。下午全系在第二教学楼开批判大会，批判的是一个曾经追求过沈达力的男生。主席台上，一个人揪住这个人的头发，几个人使劲反拧住他的胳膊。没有人认真听发言，只听到被批斗者的一声声惨叫。

不知道批斗会什么时候结束的。全场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沈达力一个人木然地呆坐在那里。

晚上，人们就在“红湖”岸边发现了她服毒自杀的遗体。的确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因为在宿舍的书包里，人们发现了她写的《遗书》。

当天，全系及时召开了大会，文革主任吕乃岩说：“她的问题，死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死后就是敌我矛盾了！”

“班文革”决定：“立即召开声讨、揭发、批判大会，把她搞臭，肃清一切影响！开除团籍；把班里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一个女大学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在一场“革命风暴”中。（见丛樟等主编，《燕园风云录（一）》）

在校文革整学生的过程中，其保卫组（二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语系63级学生林江东（女）在回忆文章《文革与不人云亦云》中写道：

1967年7月16日傍晚，吃过晚饭，我在校园里浏览大字报，走到38楼门前时，看到有上百人聚集在门前，我好奇地凑上去。一个男同学用嘶哑的声音在控诉：“大家看，这就是从校文革二组抄出来的所谓反动学生的黑名单，人数多达上百人，有中文系的张自修……，西语系的……东语系的陈小湘、林江东……”听到这里我一下子惊呆了。虽然前几个月受过两次批判，但仅限于班内，谁也没有给我定性。现在校文革二组竟然把我列入反动学生的黑名单，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一般，心中冤屈的怒火立即燃烧起来。

我走回宿舍，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心里便打定了主意：“绝不承认甚么反动学生！”。我在桌上铺开一张红色的大字报纸，挥笔疾书：“惊悉校文革二组把一个青年学生列入反动学生的名单，这是对广大革命同学的迫害。我的父母都是跟随党和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军队干部。我虽然犯过错误，但热爱党和毛主席的红心始终不变。如果说我是反动学生的话，北大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是反动学生。我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黑夜终将过去。”放下笔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找到一个浆糊桶，连夜把大字报贴在了大饭厅东墙最醒目的地方。第二天清晨，大饭厅东墙周围挤满了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胆子不小，反动学生竟敢翻天！”“她对党和毛主席那么衷心耿耿，不像是反动学生。”我夹在人群里默默地听着，坚信自己是革命学生的一员。

由此可见，在系内、班内受到批判的学生，他们的材料都上报到了校文革二组，二组整理保存了这些“反动学生”的材料，就是要在运动后期秋后算账，把这些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至少会把这些材料装入档案，让这些学生背一辈子黑锅。

1967年7月10日，“红旗飘”、“北京公社”等组织查抄了校文革“二组”驻地南阁和燕南园63号，抄出两批二组整的“黑材料”。查抄校文革的办事机构，当时确实属于大逆不道的“打砸抢”行为。抄出了大量整学生的“黑材料”，使一批学生免于被整，确实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1967年8月17日，北大校内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五个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从此北大内部两派斗争更加公开化和白热化。

聂元梓和校文革对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牛辉林恨之入骨，收集了材料，上报江青。江青在9月1日点名“红旗飘里有坏人”，牛辉林被迫辞职。聂元梓支持的“新北大公社”将反聂最坚决的生物系学生樊立勤绑架，严刑拷打，甚至用铁钉顶入膝盖，后将奄奄一息的樊立勤扔出，经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但成为终身残疾。

1968年3月29日校文革组织武斗队伍，将井冈山的学生驱赶出31楼宿舍。井冈山兵团被迫反抗后，聂元梓和校文革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井冈山学生占领的楼房断水断电，停发助学金和粮票，还派人到井冈山兵团的部分“骨干分子”家乡去抓捕。徐运朴、牛泰升、王忠林等被抓捕后押回北大进行批斗。最近哲学系66级赵希文告诉笔者，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派人曾在他河南老家农村蹲守了3个月，都被大队支书顶了回去，其实他就在校内28楼，并未回老家；而同年级的女生韩琴英则被从山东抓回，带回北京，被刑讯逼供，以致流产。哲学系俞启义和地球物理系魏秀芬躲回了哈尔滨，新北大公社派人紧跟抓捕，由于当地公安部门保护，才幸免于难。

聂元梓和校文革利用《新北大》校刊，使其成为整学生的舆论工具。1968年5月9日《新北大》第一版公布了《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把学生牛辉林打成“反动小集团坏头头”，把学生樊立勤打成“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1968年5月23日第一版，公布《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第二号公告》，把学生张景元、俞启义打成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第四版：《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大本营》，点了学生谢世扬、胡伯安、胡振初、王海、王培英、何维凌、胡定国、余水荣、臧希文、杨作森、乔兼武、魏秀芬、赵长占、刘立炎、范永奇和教师杨勋及杨勋弟弟杨炳章的名。1968年6月14日第四版：《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把化学系1963级学生樊能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1968年7月17日第三版：《关于老保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1968年7月23日第三版：《我校首次公审现行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徐运朴》，把学生牛辉林、王忠林、牛泰升、李怀进、王明德、屈长江、徐运朴、何本芳、唐竞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被“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打成“反革命分子”或“反动集团成员”的学生，虽然在工军宣队进校后有些人继续受到了审查，但绝大多数都按期毕业分配。少数被留校审查延期毕业的人，在文革结束后也都得到了平反。他们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努力工作，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其中杨作森、徐运朴因遭受批斗殴打，身体损伤，不幸过早离世。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头”的法律系64级学生牛辉林，1970年分配到山西农村后，从公社秘书作起，先后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定襄县委宣传部理论组组长、山西省委宣传部干事、共青团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太原市政协常委、山西省引黄工程总指挥部秘书长、山西省引黄工程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2006退休，2013年因病去世。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化学系63级学生樊能廷，1970年被分配到河北衡水地区，1978年考上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完成硕士学业后又攻读博士，成为教授、有机合成专家。井冈山的学生文革后，没有一个被判刑和成为“三种人”的，这在校群团组织中是少有的，说明“校文革”制造的全部都是冤假错案。

### 三、宣传队时期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接管了校文革的权力。北大的群众对毛泽东支持的宣传队抱有很大希望。过了不久，希望就变成了失望。宣传队中的军队成员由63军派出。63军在1967年1~2月份曾来北大负责军训，与聂元梓和校文革关系密切，一贯支持校文革。来北大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严厉打击干部、教师中的“阶级敌人”，短时期内就逼死干部教师多人。另一方面又严厉打击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和分子”，而学生中的被打击的，绝大多数都是原井冈山的成员。例如在井冈山成员比较多的化学系63级，全年110人，被审查和批斗的学生就有22人。挨整的都是井冈山的成员和逍遥派。其中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的广东籍学生李人杰，被打成反动学生，由于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夜晚逃出学校，在清河农村牛棚里自缢身亡。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62级被审查的3名学生都是反对聂元梓的。63级被隔离审查的4人，2人是井冈山的骨干，2人是没有参加组织的学生。此外哲学系的吴琼、历史系的姚成玉，都是井冈山的成员，地质地理系的王远枝虽然没有参加派别，观点也是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的头头牛辉林和侯汉清等，都被隔离审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押上全校大会批斗。

1968年12月18日，由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被专案组审讯恐吓，导致夫妇双双自杀，最高领袖十分震惊，派迟群、谢静宜到北大调查，发现北大存在清理阶级队伍“扩大

化”的现象。1969年春节后，8341部队进驻北大，纠正“扩大化”，一批学生才得到了解脱。据谢静宜回忆，毛泽东指示她找牛辉林谈话，把牛辉林解放了出来。（谢静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

在牛辉林生前的回忆文章里，也记述了谢静宜和他谈话的经过，证实了谢静宜的说法。（唐竞编，《怀念牛辉林》，2016年）

8341部队虽然解放了不少被整的学生，还创造了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但并没有完全停止整学生的行为。在1970年3月最后的三届毕业生分配时，还留下了部分学生不予分配，放在学校和农场劳动接受审查。笔者所知，就有化学系的齐菊生、陈醒迈，技术物理系的程汉良、刘立民、何维凌、胡定国、王彦，地质地理系的王远枝等，分别在半年、3年、8年后才被分配，1978年后才得到平反。

1971~1972年，在全国清查“五一六集团”的运动中，宣传队又把一些留校的学生和已经毕业分配的学生当成清查对象，设立专案，进行隔离审查，逼迫他们写交代材料，互相揭发。但是，最终在学生中没有查出一个所谓“五一六”分子。

#### 四、北大整学生的历史根源和指导思想

北大文革中不同阶段整学生的现象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其实，这个整学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当时，部分青年学生不过是相应整风的号召，提了一些意见，写了一些大字报，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有的被开除学籍、团籍，劳动改造，有些甚至被关押，著名的人物有林昭、谭天荣、张元勋、沈元等（林昭和沈元在文革中被执行死刑）。中央和北京市委认为前任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右倾保守”，派来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陆平接替。在北大原有的500多名右派之外，追加了100多名，使北大的右派名单达到731名，超过了清华和全国其他高校。清华蒋南翔抓的“右派”，以干部、教师占大头。北大不然，北大陆平抓的“右派”，则是以青年学生占大头。

60年代初期，在高校中对持有“异端思想”的“反动学生”的整肃，一直都没有停止，例如1964年北大哲学系就整出了以62级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为首的“X社”小集团，集团中一些学生被开除、劳改。郭世英被送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改造，1965年重新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1968年4月被迫害致死。

1966年文革开始后工作组又把矛头指向学生，在学生中“排队划线”，企图抓出右派学生，杀一儆百。校文革和宣传队继承了工作组的衣钵，变本加厉地整“反动学生”，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血腥的事件。他们的“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斗争哲学”学得很好，用得也很到位，整学生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和拿手好戏。

当然，他们并不是整学生的首创者，他们信奉和依赖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等一系列最高指示。在这些最高指示的指导下，他们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活跃的、有独立思想的、不听话的、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学生视为大逆不道，必欲整之而后快。在文革中，有一些学生通过实践和认真思考，逐步对中央文革、江青、林彪产生怀疑和不满，对文革本身也产生怀疑，在底下议论或写出大字报。还有一些北大学生，只是对聂元梓飞扬跋扈，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做法反感，参加了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甚而成了反聂骨干，就都成了挨整的对象。而这些学生，绝大部分在井冈山兵团里。笔者没有对北大文革中挨整学生的数量做过精确统计，但可以肯



定的是，被整的学生中井冈山的学生的比例远远大于公社的学生。有人说宣传队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于校文革时期，这是事实（主要是清队中自杀的干部教师数量多），但绝对不能因此说校文革就比宣传队好，他们整起学生来都同样毫不手软。说校文革整死的人比宣传队少，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也是校文革比宣传队短寿得多所致。

熟悉北大校史的人都知道，老校长蔡元培对学生是多么爱护，五四运动中北洋政府抓走部分学生，蔡校长亲自交涉解救，不惜辞职表示抗议。后继者蒋梦麟和胡适，虽然不主张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等政治活动，但从来没有把学生中的反对政府者交给当局，而对被捕的学生也出面保释。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也是如此，多次拒绝军警进校抓捕学生。而作为当时学校领导人（文革主任）的聂元梓却在江青面前诬告学生牛辉林，在最高领袖面前诬告研究生侯汉清，可见聂元梓人品之卑劣。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统治者总是会把反对自己的甚至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视若敌人，进行打击迫害，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人人自危。这次运动你整人，下次运动你可能就成了被整的对象，试看那些老干部，在历史上哪个没有整过人，又有哪个没有挨过整？要真正杜绝人与人互相整的现象，必须深挖这种整人的思想理论基础，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斗争哲学，建立民主和谐的法治社会，才能避免文革悲剧在中华大地上再次重演。这也是我们彻底否定文革、反思文革的应有之义。

□ 原载于网刊《记忆》175期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八）

• 吴中杰 •

（上接1910d）

▲ 假作真时真亦假

果然，我的问题很快就升级了。尽管揭不出什么材料，还是把我关进了隔离室。

同是隔离审查，看守在学生宿舍和囚禁在隔离室是不一样的。不但待遇有别，而且显示出问题严重性的差异。罪名较轻的，看守在学生宿舍，虽然不能自由活动，但毕竟生活在人群中，外界的情况多少能够了解到一些；罪名较重的，就关进隔离室，那实际上是一所私设的监狱，进到这里面，就真正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了。

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学生宿舍看书，我的专案组组长刘家国、工宣队连长袁瑞云和军宣队莫某人一起走了进来，由袁瑞云带头，先训斥我态度顽固，不老实交代，然后宣布，说我的问题十分严重，马上关进隔离室。当下就要我收拾行李，把我送到了隔离室。

当时复旦园内隔离室不止一处，我被送到学生宿舍十号楼。这里整整一层底楼都腾出来做隔离室，又从工厂里调来一批民兵——当时叫“文攻武卫”——轮班看守，气象十分森严。我被押进去后，先在值班室登记，然后由一个民兵带到一个房间。这个民兵个头很大，孔武有力，但见到我这个文弱书生却如临大敌，态度严厉，气氛紧张。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大字报上把我们描绘成一伙亡命之徒，所以他很警惕吧。我放下行李后，本以为可以铺床休

息了，不料他却还有许多训示，而且要我交出除《毛泽东选集》之外的一切书籍、纸张，以及小刀、钥匙、剃须刀等等，最后，还要我解下裤带、鞋带，只留下一根很短的绳子，让我刚够将两个裤袢拉在一起，使裤子不致掉下来。我知道，这是防我自杀。我心里感到好笑，但却笑不出来。

等到一大批押送的人都走掉，咔嚓一声，民兵将房门反扣起来，我才定下心来细细地看一下房间。在复旦生活多年，学生宿舍我是很熟悉的，只是这间房子除了一桌一凳一张床铺之外，别的东西都已搬掉，就显得空空荡荡。墙上没有装饰画，只有几条标语，写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类标语最近见得多了，也并不显得触目惊心。令人讨厌的是窗玻璃大都涂上了红漆，对外的玻璃窗只留下最上面一格没有上漆，可以透进光线；朝走廊的门玻璃，只留下一小块没有漆，那是为了监视用的。这就使人有与世隔绝之感。窗外小道是学生上食堂的主要通道之一，时时有人走过，但外面的行路声和讲话声却反而衬得房内更加寂静。复旦沉浸在一片怒喊中，有谁能理解我们呢？我的心感到分外的寂寞。

复旦正经历着烦躁的不眠之夜。我们被关在隔离室里写交代材料，许多教师和学生被驱赶上“阶级斗争的战场”，通宵写大字报。虽然双方处于对立的地位，其实大家都不过是扮演某种角色的傀儡，编剧和导演在康平路市委大楼里。而那些头头们也处于紧张状态，据他们看来，“小集团”这伙人太顽固了，只肯交代（又鸟）毛蒜皮之事，不肯交代实质性问题。而抓不住实质性问题，就定不了案，场面搞得愈大就愈难下台。这是从大会小会上的训斥声中可以推论出来的。

他们忙着寻找突破口，而突破口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何穆写给邱励欧的一封信和陈建炜、孟金璘编辑的《远方战友通信集》。高音喇叭整天播送着通令、战报，并摘要地播送这两份材料。他们认为何穆的信是“胡守钧小集团”的反革命纲领，而《远方战友通信集》则是反革命秘密刊物和联络图。

我没有看到过这两份材料，从广播中引用的片段看，何穆的信无非是对现实情况的一些不满，如说“我对清队（按：指清理阶级队伍）的背景和方向是始终怀疑的”，还有对于前景的一种预测，如说“以后要多少时候，恐怕会有一场很大的变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各种集团、派别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而在对外地落后状况的指责中，还透露着对上海和复旦的留恋：“从复旦情况的改变，可见上海在运动中是走在前面的，出了上海看看外地，简直无法与上海相比，哪里有像以前我们在复旦那么民主。新上台的则公开声称自己一贯是正确的，什么原则和政策都是没有的。什么辩论、大字报，拳头和子弹就是真理。上海确实是有一些现代文明的，这跟它长期受影响有关的。外地的工人与上海工人相比，简直是道道地地的农民。”至于《远方战友通信集》，则纯粹是大学毕业生缅怀旧情的产物。这些材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革命的计划、纲领和联络图之类。何况，计划和纲领，一般应该是由该集团的首脑提出，再经全体会议或核心会议通过，才算有效。现在既然认定胡守钧是反革命小集团的第一号人物，而这个“反革命纲领”，却是某一个成员写给第三号人物的私人信件，这在逻辑上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

但逻辑学和法学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显得分外无力。一旦当权者宣布何穆的信是“胡守钧小集团”的反革命纲领，这便是铁定的事实，尽管胡守钧、周谷声在批判会上都声明没有看到过这封信，而邱励欧则拿出材料来证明她一开始就不同意何穆信中的观点，但这一切均不发生效力。就凭这些材料，胡守钧及其伙伴们已被确定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小集团。

缺口是由何穆的一封信打开的，分化瓦解工作当然也就从何穆开始。

何穆是工人的儿子。他母亲早亡，由父亲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成人。这正是忆苦思甜的好材料，工宣队当然不会放过，专案组拉着何穆的父亲到隔离室来做何穆的工作，这是阵前喊话的老传统。老工人不明白事情真相，总相信领导者的话是正确的，——在那个时候，人们评价是非的标准往往是由发言者的政治地位来决定的，“这是春桥同志讲的话，还会错吗？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啊！”这有如鲁迅所说的：“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是对的，还会错吗？他田地就有二百亩！’”何况，眼前这个阵势，也真够吓人，他深为儿子担忧，还是赶快劝儿子举手投降，回头是岸吧。何穆在专案组软硬兼施之下，也想争取做个从宽处理的典型，就什么都承认下来了。

何穆一承认，就“证实”了胡守钧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小集团。何穆是反革命纲领的制订者，他本人都承认了，那还会有假吗？虽然，人证和物证都经不起推敲，但那时中国人上上下下都缺乏法制观念，谁还会细加推敲呢？领导上说的，再加上本人承认的，这就是铁案如山了。

而且，何穆这个缺口一打开，也的确引起了连锁反应。被当作“胡守钧小集团”而受隔离的人，明知何穆说的是假话，但既然说假话能从宽处理，而坚持说真话的人成了反革命顽固派，批斗规格不断升级，他们为了拯救自己，当然也就学说假话了。假话是顺着上面定的调子说的，于是需要什么材料就有什么材料，上面提出的任何假设都能得到“证实”。战果愈来愈辉煌，问题也愈来愈严重。评论员在高音喇叭里教导那些善良的人们说：过去有人以为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现在揭出来一看，不对了，他们原来是一伙新生的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切不可被他们的假象所蒙蔽，云云。

这种语调，显然是模仿当年《人民日报》上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小集团”材料的按语。不但按语模仿，而且整个案件的作法都在模仿。《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们的私人信件，加上按语，复旦广播电台也公布了我们的私人信件，加上按语；当年在胡风小集团中分化出了一个舒芜，令他反戈一击，作为从宽处理的典型，今日如法炮制，也在“胡守钧小集团”中分化出一个何穆，让他揭发交代，既打开了缺口，又作为诱饵……这样看来，康平路那些编剧和导演连一点创造性都没有。我本来也很天真，对报纸上的言论和材料是深信不疑的。遥想1955年，读了《人民日报》上公布的三批关于胡风集团的材料，确实大吃一惊，认定胡风集团是一批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直待这回他们按“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模式，如法炮制了一个“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而且把我也“团”在里面，虽然批判者义正辞严，但所据材料，凡我所知者，皆胡编乱造，这就使我对以往的案子也怀疑起来了。以今例古，莫非胡风集团案件也如我们这个案件一样，是一个编造的假案、冤案？

禅机一旦参透，便可一通百通。虽然隔离室与外界隔绝，但我可以从高音喇叭播送的通令、战报里参悟很多东西。虽然这些通令、战报是揭露“罪行”的，内多恐吓性语言，但毕竟透露出不少信息。此所谓正面文章反面看是也。鲁迅曾从儒家之大力提倡“中庸”来推断中国人非中庸之道，又由此论定孔夫子有胃病，认为否则他老人家不会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盖有所缺，才有所需也。我亦当用此法来观察问题。有一回，通令警告某人，不准他翻案。我知道，这位年轻朋友大概是顶不住强大的压力，承认了他所不曾干过的事情，于是专案组得寸进尺，穷追猛打，他感到胡乱认罪没有个尽头，就提出翻案，但广播里说“认罪是可以的，翻案是不允许的”，不准他缩回去。这个人不但翻不了供，还加上了一个态度恶劣的罪名。这使我坚信，一定要实事求是，决不能胡乱认罪，要顶住逼供、诱供，否则便会给自己制造麻烦。

专案组和军、工宣队负责人不断地到隔离室来做思想工作，谓之“政策攻心”。他们认定我是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只因为有顾虑而不敢交代问题，所以动足脑筋，威胁、诱惑，迫使我交代。工宣队连长袁瑞云是威胁的行家，他多次声色俱厉地指着我的鼻子说：

“像你这样的人，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自己又罪大恶极，有几个脑袋都可以砍下来。现在没有将你送公安局，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你不再坦白，错过这个机会，后悔就来不及了。”工宣队指导员庄明玉比较温和一点，他反复交代政策，无非是丢掉幻想、放下包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我不知道他们是脾性不同，还是有意约好分别扮演红脸白脸的角色，用来软硬兼施。但对我似乎都不发生作用。因为他们的所有工作都建筑在一个大前提上，即认定我是一个罪行严重的人，而我则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倒是认为他们在践踏法纪乱整人。当然，这种想法我也不会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如照直说出，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一条新的罪状。既然他们连我心里想些什么都搞不清，还讲什么攻心战呢？所以他们许多用来攻心的利器都没有击中实体，虽然我不时要装出感动状，但实际上却丝毫不起作用。

最狡猾的是我的专案组组长刘家国，他经常抛出一二点具体材料，说某某人交代了什么事，供出了你在场；某某人交代了什么攻击性言论，难道你就没有说过？我知道，这是在诱供，要我按他所提供的路子来交代问题。我当然不会上当，但也不能当面揭穿，只好装聋作哑应付过去。我心里想，这些人毕竟肚里墨水无多，智商太低，思路单一，对知识分子的心思毫不理解。也许，那种办案方式本身就必然会造成逼、供、信的结果，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法制观念，不可能从法律上考虑审查对象有无罪的可能性，当然也不会去做证伪的工作。而高居领导地位的人却有罪恶的动机，反正他们整错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上的责任。

要说他们完全没有机智，也不符合事实。但他们的心思完全用在逼供、诱供、套供上，那是一种农民式的狡猾。有一回，刘家国到隔离室来作过一番政策攻心之后，将笔记本留在我的桌子上走掉了。专案组长的工作笔记本对于专案对象来说，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现在房门反扣着，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翻开笔记本，必然会获得许多秘密。但我转而一想，觉得不对头。刘家国是一个十分精细的人，他怎么会干出这种糊涂事呢？莫非其中有诈？我抬头看一眼房门玻璃上的监视窗，发现外面似乎有个人影一闪。我立时明白：这是诱供的新花招。刘家国是故意把工作笔记“遗忘”在我的桌子上，让我可以偷看到里面记着的别人交代材料，然后就拼命逼供，逼得我按这些材料来交代，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在不同隔离室中的人分别交代出来的相同材料，证明了我们的确犯有这些罪行，将来就连翻供都不可能。一旦悟到这点，我立即正襟危坐，目不旁视，装作专心学《毛泽东选集》的样子。过了一会，刘家国开门进来，说声忘了东西，将笔记本拿走了。

每隔一两天，我就要被带出去批斗一次，有时大会批斗，有时小会接触。不管怎样，能到隔离室之外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总是好的。记得第一次开批斗会时，很有点紧张，一则没有经验，二则面子上拉不下来。几次批斗下来，就无所谓了。正如上海人所说，反正连夹里也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面子呢？而且慢慢地积累了经验，基本上可以应付裕如了。工宣队袁瑞云说：“我们要七斗八斗，把你们斗得老实起来。”其实，斗的次数愈多，愈不起作用。毕竟是毛泽东聪明，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曾经赞扬过一个乡农会的巧妙做法：他们“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领导人也用这个办法来对付我们，我们可能也会被搞得终日心情不宁。可惜这些自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其实并没有认真读过《毛泽东选集》，所以也没有这个水平来运用这种巧妙的做法，而是一开始就狠批狠斗，使被批斗者很快就适应了批斗会的声势。他们毕竟不懂心理学。

批斗会也可以给我带来不少信息。单是从隔离室到会场的路上，我就可以看到许多东西：大字报的标题，人们的神态，等等。有一回，“南京路”上看大字报者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其热闹程度不亚于炮打张春桥时节。我知道，这是市革会存心在复旦搞“一打三反”运动的样板，正组织全市各单位的人来参观学习。否则，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人们是没有这般闲情逸致来看热闹的。

为了防止有同伙夹在人流中给我传递信息，专案组绕开大道，将我从僻路带往大礼堂。然而连僻路上都充满运动的气氛。这条僻路通过物理大楼门口，那里赫然贴着一幅大标语：“揪出物理系的吴中杰——潘笃武！”原来我的名字已经成为专有名词，我已被塑造成某种典型了。看来，在这出闹剧中，我的角色已经派定，无可推却了。

而且，在批斗大会上得悉，全校各系还揪出了许多小吴中杰，或吴中杰式的人物。听说，叶春华就被打成“新闻系的吴中杰”。

这虽然很使我感到光荣，但同时也深感内疚。因为有些人是多少受到我的牵连的，潘笃武就是其中一个。我与小潘是1967年下放劳动时的朋友，大家都是炮筒子，性格比较相投，所以回校后仍时相往还。“文革”初期，他也因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做过官，而吃了许多大字报，并被打入劳改队。我们同病相怜，当然也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当“过河卒”救我出险境时，我也拉他一把，从此，潘笃武也与卒子们常有来往。不想现在倒反害了他。

更使我悲哀的是，我还牵连了许多学生。“过河卒”小组的成员首当其冲。他们在毕业时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很得到赞扬，现在其革命性全被抹杀，已被揪回来几位了。王之平已在批斗我的大会上亮过相，她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女，很有灵气，也很有主见，现在却不知被工宣队用什么法术整得木头木脑了。邢维也被揪回来了，她还怀着身孕。真残酷，一点人道也不讲！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那位学生肯定也被牵进去了，因为已经广播了我给他的一封信。

往日上历史课时，老师讲到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孺灭十族，株连到他的学生，大骂其凶残为史所未有，想不到今日却在我身上重现了。

株连之广，到后来我才逐渐知道。凡与我有些来往的学生和朋友，无不受到复旦公函、电话或外调人员的追踪，从而在本单位受到审查、冲击。《人民日报》记者黄保真告诉我，他于1970年初到上海组稿，带走了我的一篇稿子，人还未回到北京，上海市革会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叫他们不能发我的文章，否则就会与上海唱对台戏。好在有人帮忙说话，总算没有处理黄保真，但从此不准他再到上海来。

还有一位中二年级的学生林之丰，平时与我并不接近，只是为我讲了句公道话，就受到党纪处分。那时有人揭发我曾经批评过姚文元的美学观点，工宣队就要给我定上反姚文元，亦即反中央文革之罪，林之丰说：美学观点与政治观点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姚文元写美学论文是在文革之前，那时还没有中央文革，他也还不是中央领导，恐怕不能这样定罪。结果是林之丰自己犯了“同情反革命”之错误。……如此等等，难以一一备述。

批斗会虽说是大家来批斗我，但也是批斗者各自亮相表演的场所。一旦沉下心来，我在应付追问的同时，倒也还有余暇来欣赏各种嘴脸。有些人是调子高而其实并无实际内容，有些人只拣别人揭发过的事再说一遍，显然是应付差使，并不积极。我的一位老同学声讨说：“你既然是‘胡守钧小集团’的黑谋士，难道你只知道这么一点事情？这是什么黑谋士？”

这看起来是先定罪名而后循名责实的方法，但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既然我只知道这么一点事情，就扣不上黑谋士的帽子了。只是我当时不好提出这样的反诘。有些人实在揭不出什么材料，但又表现自己是积极参加斗争的，就将一件普通小事说得危言耸听。有一位自身难保的教师揭发道：“有一次我看到吴中杰在看《北洋军阀史话》，这证明他自己想当军阀！”其实他什么也证明不了。谁都知道，这种材料是无法定罪的，但为了某种需要，工宣队也会将它视为珍宝。比如，他们曾抓住方农的一句话：“我的肩膀上是要挂元帅肩章的”，就要定“胡守钧小集团”以篡军夺权之罪。我不知道方农是否真说过此话，——即使说过，又能算什么罪行呢？军事家不是说“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决不是好士兵”吗？而我自己是绝对说不出此类豪言壮语的。因为我自知只能拿拿笔杆子，决没有耍枪杆子的本领。但工宣队觉得定方农一人篡军之罪总还不够，既然要抓军权，必然要有同伙，自然少不了我这个当军师的。所以在一次批斗会上就追问我有无篡军夺权的打算。我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听都没听说过。于是再三追问，在高呼“吴中杰必须老实交代”的口号之后，就由一个人抛出一条材料说：“你是不是说过，要是打起仗来，你想做个军事记者？”我当即如实承认：“说过这话。”主持会议的工宣队员说：“你想钻入军队，不是篡军夺权是什么？”我立即申辩，试图说明做军事记者与掌握军权完全是两码子事，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战争一旦爆发，做名军事记者是自然之事，怎么能说是篡军夺权呢？但不容我说完，马上被“吴中杰不老实就打倒他”的口号声压下去了。于是我只好肯定篡军夺权的罪名回到隔离室去，俨然成为一个夺权失败的元帅或将军。

当然，也有些人是挖空心思，无中生有，加油加醋，上纲上线，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想踩着我的肩膀爬上去。有一位历届积极分子揭发我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证据是系里有人开赵树理研究专题课时，我说过：“鲁迅研究可以开专题课，《红楼梦》研究可以开专题课，但并不是所有作家作品都值得开专题课的。”据他分析，这就是否定毛主席诗词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可以开专题课，当然也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于是乎我的“三反”（即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之谓）罪名就定讞了。我虽然是久经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但如此锻炼周纳法，却实在令我吃惊，气得我再也没有闲情逸致来玩味那些有趣的嘴脸了。

但此公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稍稍沉默了一阵子，仍然做起了积极分子，而且弄得报纸上都登出大块文章来宣传他的事迹，领导上还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我真不能不佩服他玩世有术了。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